

佛教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郁龙余

内容提要

藏族、蒙族、傣族等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曾受到佛教的巨大影响。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都具有开放文化性格,在中外文化交流和发 展祖国文化中作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 佛教,文学,少数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跟汉族文学一样,各个方面都曾受到佛教的巨大影响。但是,由于佛教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有着不同的历史与过程,又使得两者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佛教给汉族带来的几乎全是清一色的佛教文学,而给少数民族带来的除了佛教文学之外,还有大量非佛教系统的印度文学。

西藏原先信奉本土原始宗教本教(BON)。佛教传播始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墀尊公主入藏,同时带去了汉地佛教与印度佛教。为着政治上的需要,松赞干布大力弘法,佛教首先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所接受。公元821—822年,唐王朝与吐蕃首领举行长庆会盟,“盟毕以浮屠重为誓,引郁金香以饮”^①。这说明佛教在此时已影响到政治领域。尽管佛教与本教有争斗,佛教内部显密两宗之间也有摩擦,印度佛教与汉地佛教也互有抵牾,但佛教还是在西藏高原牢牢地扎下了根。公元8至9世纪,由婆罗门教逐步衍化而成的印度教,在尼泊尔境内与佛教渐趋合流,形成新佛教(混合密宗)。在新佛教中,佛教与印度教的界限很难分清:教徒们信奉同一神祇,举行共同祭祀,过共同的宗教节日。公元11至13世纪,穆斯林军队入侵印度,尼泊尔成了印度教徒的避难所,进一步促使了印度教与佛教在尼泊尔的合流。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这种宗教合流对西藏产生了莫大影响。西藏文化的众采博取、多元兼容的特点,与这种影响有着深刻关系。8世纪成书的藏医名著《四部医典》(《华丹悉据》),将藏医、汉医、印医、大食医熔于一炉。该书在序言中写道:“天神、仙人、外道徒、佛教徒围坐在医学上师琉璃光王的四周。”^②这位琉璃光王能发出“千万道佛光,普照十方”,又称“大医王佛”。所以可以说,以佛为主是藏族传统文化的又一特点。不管众采博取、多元兼容还是以佛为主,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我所用。于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藏族文化又自成一体,自成特色。

藏族文学是藏族文化的一部分,具有藏族文化的以上各种特点。

印度文学灿烂辉煌,《吠陀》、《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往世书》等作品,印度教奉为圣典。东来的佛教徒一般都出于门户之见,避之若浼,讳莫如深,在汗牛

本文于1990年12月收到。作者系本校国际文化系副主任。

充栋的汉译佛典中很难寻觅它们的踪影。如大史诗《罗摩衍那》在印度家喻户晓,而在汉译佛典中只有两则小故事,经专家钩沉发掘才知道它们是罗摩故事的梗概。在藏族地区,情况大不一样。《罗摩衍那》很早就有藏译本,在敦煌石窟里就发现有5个编号的藏文《罗摩衍那》。公元1439年,祥雄·却旺智已模仿其内容,创作了一部名为《可伎乐仙女多弦妙言》的诗著。后来,谢雄·阿旺丹白加措又为此书作了注。陇钦巴的《佛宗宝库》及其它一些著作中,都有繁简不一的《罗摩衍那》的故事内容。这部大史诗还一直流传在藏族人民的口头,并对藏族自己的史诗《格萨尔》,从人物性格的塑造到故事情节的处理,都产生过深刻影响。

印度著名故事集《五卷书》,也很早随佛教传入西藏。其中许多故事经过长期的加工改造,已成为藏族自己的民间文学。当然,我们如果加以适当分析比较,两者的渊源依然可辨。例如:藏族民间故事《双头鸟》源于《五卷书》中的《双脖鸟》,《兔杀狮》源于《狮与兔》,《鸱鸒与大海》源于《白鹤与大海》等等。

《僵尸鬼的故事二十五则》是印度流传广泛的民间故事,有多种藏文译本,主要有四川德格16回刻本《具神通的故事》、青海13回手抄本《具神通的人尸故事》,西藏21回手抄本《起尸变金的佛法故事》。1963年,参照各种版本,青海又出了一个35篇的新版本。

印度中世纪伟大诗人迦梨陀婆的著名抒情长诗《云使》、戒日王的5幕戏剧《龙喜记》、檀丁的文论名著《诗镜》等,不但都有藏文译本,而且对藏族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产生过不少影响。例如,《诗镜》在13世纪由雄顿·多吉坚参全文译出后,藏族学者研习成风,历代为之著书作注者不乏其人,并引为创作指南。许多文人遵循讲究修辞、喜用词藻、注重形式的创作思想,自成一派,史称“年阿体”。这一文学流派在西藏民族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先后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诗人和学者,如14世纪的宗喀巴大师、16世纪的夏鲁译师却炯桑堡、17世纪的五世达赖罗桑加措与米旁格来纳杰、19世纪的米庞嘉错等等。

当然,伴随佛教传入的佛教文学,在西藏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7世纪起,西藏就开始翻译佛经,主要译自梵文、巴利文,也有译自汉文和西域诸文字的。译经活动一直持续到16世纪,前后经历约900年。所译佛典数量十分宏富,全部收入《藏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正藏)、《丹珠尔》(副藏)。以著名的北京版计,《甘珠尔》有1055部,《丹珠尔》有3962部。除此,还有《松棚》(杂藏)。由于重译者极少,所以其实际内容大大超过汉译佛典。大量佛教文学就蕴藏在这烟波浩渺的《藏文大藏经》中,包括佛教文学的优秀作品如马鸣的《佛所行赞》、寂天的《入菩提行》、《一百五十赞佛颂》、《佛本生经》,以及《百智论》、《智慧树》、《如意藤》、《贤愚经》、《颂藏》、《百句颂》、《圣者义成太子经》、《修身论》、《众生生养滴》等等。佛教文学,主要是寓言与故事,有着无穷的魅力,长期在藏族人民中流传。如《本生故事》、《善事太子》、《婆世蹉》、《如意藤》中的《诺桑明言》,《贤愚经》中的《梨耆弥七子》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故事名篇,深受藏族人民喜爱。

佛教文学的贡献,不但是丰富了藏族文学,而且对藏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包括文学的题材、形象、体裁、语言、思想诸方面。例如,13世纪上半叶,著名学者萨班·贡噶坚参从内容到形式参照佛教作品《百智论》、《众生生养滴》、《修身

论》等，写成《萨迦格言》一书，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甚大。诸如后来涌现的《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火的格言》、《天空格言》、《宝贝格言》，无不仿效《萨迦格言》，有着佛教的鲜明印记。

藏戏与佛教关系至深。一般认为，藏戏诞生于15世纪初，著名僧人唐东布杰是其开山祖师。为了募捐修建铁索桥，他从穷结县请来能歌善舞的7兄妹，以佛教故事为内容，自编自导富于民族特色的歌舞剧，在西藏各地义演化缘。随着一座座铁索桥凌空出现，藏戏也逐渐形成了。^③藏戏的传统剧目，思想内容多受佛教影响。著名剧目《诺桑王子》、《智美滚登》等即由佛教故事改编而来。

唐卡是藏族特有的轴画，与佛教也有着密切联系。每当制成新的唐卡，一定要请喇嘛诵经加诗，在背面加盖金汁或朱砂手模。唐卡内容丰富多样，但以佛教故事为最重要。这种佛教题材的唐卡，不仅为寺院所必备，民间亦有大量珍藏。

酥油花庄严灿烂，堪称藏族文化一绝，所谓“神匠巧夺天工”、“年年花样不同”。它诞生于礼佛，题材亦以佛教文学故事为重，诸如《本生经》、《目连救母》、《唐僧取经》等等。

蒙族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与藏传佛教在蒙族中的传播密不可分。公元1207年，成吉思汗邀请西藏萨迦派（花教）首领贡嘎宁博到蒙族地区弘法。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征服西藏13万户后，相继将该教派首领萨斯加娃及其侄子八思巴封为帝师。16世纪，格鲁派（黄教）在西藏兴起，内蒙土默特的阿拉坦汗邀请索伦嘉措（达赖三世）到青海讲经，建造了内蒙第一座寺庙。索伦嘉措死后，阿拉坦汗之孙转世成达赖四世。自此，西藏喇嘛教与蒙古族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随着喇嘛教在蒙族地区的传播，大量佛典被译成蒙文。蒙文佛典，除一小部分译自印度原文外，大部分译自藏、汉、满文佛典。公元17到18世纪，卷帙浩繁的藏文佛典《甘珠尔》、《丹珠尔》译成蒙文，其中包括数量宏富的佛教文学。《释迦牟尼佛传记》也被译成蒙文。跟藏族一样，佛教带给蒙族的除佛教文学外，还有大量非佛教系统的印度文学，例如《故事海》、《魔尸》、《金光》、《三十二个木偶的故事》、《五卷书》等等。其中以《五卷书》的影响为最大，至今流传在蒙族中的许多民间故事，都与《五卷书》有着渊源关系。如蒙族民间故事《乌龟与猴子》源于《五卷书》的《海怪与猴子》，《白猫之冤》源于《埃及之冤》，《骄傲的天鹅》源于《天鹅与猫头鹰》，《老鼠女儿的婚事》源于《老鼠嫁女》，《苍鹭和乌龟》源于《白鹭与螃蟹》，《青蛙搬家》源于《天鹅与乌龟》，《老虎与松鼠》源于《大象与老鼠》等等。当然，这些故事大都不再是《五卷书》中的原来模样，而是不同程度地被加工修改，成了蒙族自己的文学作品。例如，在《五卷书》中，《海怪与猴子》和《狮子与豺狼》是两个故事，但到蒙族民间故事里，二者合而为一，成了一则《乌龟与猴子》，情节变得更加曲折，内容也更加充实了。这些故事在民族化的同时，还往往被佛教化，涂上一层佛教色彩，为佛教传播服务。这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

英国学者查尔斯·埃利奥特曾这样指出：“印度神话的确常常不是伴随佛教的传播。但是在西藏和蒙古则伴随有许多印度神话……”^④从中国的汉族藏族及蒙族的情况看来，查尔斯·埃利奥特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不过他说的“印度神话”似应理解为非佛教系统的

印度文学,才更恰当。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傣族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上座部佛教对印度教系统的印度文学作品不象传入中原的大乘佛教那样避之若浼。另外,印度教在东南亚一带曾经很有地位,印度教文学对东南亚各国产生过很大影响,加上佛教与印度教在东南亚地区也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合流,我国傣族聚居地区毗邻东南亚,在文化上历来交往频繁,这样,上座部佛教给傣族带来的除了佛教文学之外,还包括丰富的印度教文学。

《佛本生故事》深受傣族人民喜爱,其中不少故事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加工改造,成了傣族人民自己的文学财富。例如流传至今的民间故事《螃蟹与鹭鸶》、《绿豆雀和象》,实际上是《苍鹭本生》和《鹤鹑本生》的改译。在傣族地区,流传着数量巨大的“阿奎故事”的长诗,只在德宏州地区就流传着500多部,描写释迦牟尼出道成佛前500多次转生的事迹。所以,有人认为这“阿奎故事”,就是《佛本生故事》的傣文编译和演义,指出,“阿奎”一词来自梵文,指有本领的匠人,在傣文中指出出身贫寒但本领高强、技艺超群的英雄或福星高照的善心人。几乎每个故事里都出现“雅西”(深山修行的佛僧)和“混西迦”(天王),充满浓郁的佛家色彩。

《论傣族的诗歌》是傣族著名古典文论,成书于360多年前,作者是位当了32年和尚的学者。在这长达4万多字的论著中,多次提到佛教对傣族文学的影响。例如论著中提出:傣族长篇叙事诗《相勐》产生于“绿叶信时代”,是根据佛祖的经书改编的。《相勐》是否由佛经改编,学术界尚有争议,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是伴随着佛教也借助了佛经得到保存和流传的。^⑤另一部傣族古典文论《谈寨神勐神的由来》,则详细论述了佛教对傣族原始宗教和文学的影响。其中这样写道:佛教比琵琶鬼还鬼,神不知鬼不觉,偷偷地窃取了“蛇曼蛇勐”的魂,而加以斩头去尾,变成佛教自己的东西。同时,文中还指出:佛教也有值得赞赏的地方,它给愚蠢的人类带来了文字和经书。

《兰嘎西贺》是傣族人民最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之一,与泰国的《拉玛坚》是姊妹篇。实际上,它们都源于印度的《罗摩衍那》。《拉玛坚》情节生动,富于戏剧色彩,具有鲜明的泰国特色。《兰嘎西贺》与印度原作较接近,但在流传过程中也产生了巨大变化,成了傣族人民表达追求自由幸福的理想,猛烈抨击暴君与暴政的作品,成了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当然,它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不少传本都出于佛教寺院。在泰国,这部史诗更是成了“罗摩经”,被视为珍宝。《兰嘎西贺》丰富了傣族的文学生活,对傣族的文学创作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它有可能对汉族文学,尤其是《西游记》的创作产生过影响。有人撰文指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许多方面和《罗摩衍那》(或《兰嘎西贺》)中的猴王哈奴曼非常相似,不能设想他们之间没有渊源关系。”^⑥

佛教还将印度《五卷书》中的故事带到了傣家,如在傣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双头凤》、《螃蟹和鹭鸶》等都源于《五卷书》。

在我国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中,也流传着众多印度故事。其中,以维吾尔族尤为突出。例如:维吾尔族民间故事《石鸡》、《能吃铁的老鼠》、《五彩兽》,分别源于印度《五卷书》的《鸽王》、《老鼠吃秤》和《豺狼为王》等等,数量很大。这种情形的出现,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作为“王子教科书”的《五卷书》,约于公元570年

终于外传，被译成波斯巴列维语，后又译成阿拉伯语，进而改写成《卡里莱与笛木乃》，在阿拉伯人民中广泛流传。在创作著名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过程中，阿拉伯人又将《五卷书》中的许多故事融入其中。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印度故事在我国维吾尔族中扎下了根。第二个原因，维吾尔族聚居地区，曾是丝绸之路的中段，中外文化交流荟萃之地，罗马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里交汇，异彩纷呈。其中高昌回鹘汗国，从汉文、梵文、藏文翻译或改写了大量佛经，其中包括大量文学故事，著名的佛本生故事就在其中，现在有案可稽的有《恰希塔尼·伊力克伯克》、《哈勒亚木哈拉和帕帕木哈拉》、《两王子的故事》、《神猴和帕德摩瓦提姑娘》、《达尼提·帕拉》等等，此外尚有《佛教诗歌集》、《玄奘传》等作品流传。许多故事民族化程度很高，如《恰希塔尼·伊力克伯克》，说主人公是菩萨转世，英勇无畏，为民除妖，反映了维吾尔族人民战胜邪恶、渴望光明的强烈愿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高昌是佛教的天地，佛教文学不仅在本地十分繁荣，而且对中原地区也有所辐射。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并取得统治地位，佛教就衰落下去了。但是，佛教故事已在人民中深深扎根，经过一定的改头换面，与通过伊斯兰教从阿拉伯传来的印度故事一道，长久保留下来。

以上，简要介绍了佛教与我国藏、蒙、傣等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主要包括随佛教传入的佛教文学与非佛教系统的印度文学及其二者的民族化，非佛教系统印度文学的佛教化，佛教文学与非佛教系统印度文学作品及文论对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影响等。这从一个重要侧面告诉我们：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具有开放的文化性格，对外来文化不但敢于吸收，而且善于消化，为我所用，大胆改造创新，为丰富、繁荣和发展祖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

①见新旧唐书《吐蕃传》。

②宇妥，元丹贡布：《四部医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③《西藏风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④《印度教与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卷，第438页。

⑤参见潜明兹：《〈相勳〉与英雄史诗比较研究》，《民间文学》1981年第十期。

⑥杨智勇：《民间故事大同小异的由来》，《民间文学》1981年第一期。

Buddhism and Literature of National Minorities in China

Yu Longyu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minorities, such as the Tibetan, the Mongolian and the Tai, has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Buddhism. Like the Hans, the national minorities of China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opening cultures and have rendered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sino-foreign cultural interflow a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of the motherland.

Key words Buddhism, literature, national minority

